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1]](#footnote-1)\***

向国成 刘晶晶 罗曼怡

摘要：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可以发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而这被理论界称之为“斯密-杨格定理”。从思想史贡献和理论体系来看，这一命名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贡献。本文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著，开展了以下工作：（1）追溯思想渊源，梳理发展脉络，从思想史上阐明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最完整地论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思想；（2）阐明“两类分工”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并对“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提出新解释；（3）基于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解析分工的内在结构，提出以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以此为基础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分工发展；市场扩展；经济发展机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但由于劳动分工起因于人类的交换倾向，从而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2]](#footnote-2)这被称之为“斯密定理”（Stigler，1951）。要深化分工，就要扩展市场范围，就需要通过人口在城市集中和提高运输能力等来提高交易效率。从交易效率提高到扩展市场范围（或者市场规模），再到分工发展，这是“斯密定理”的基本逻辑。到1928年，阿伦·杨格（Allyn Young）对斯密定理做了重新表述，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Young，1928）。这被理论界命名为“斯密-杨格定理”。尽管这一思想曾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正如斯蒂格勒指出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Stigler，1976）。但随着处理报酬递增的数学方法——[库恩-塔克定理（Kuhn-Tucker theorem）——](https://bbs.pinggu.org/thread-1039235-1-1.html)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展出来，20世纪80年代被运用到经济学中处理分工与报酬递增问题，罗森（Rosen，1983）、罗默（Romer，1986）、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 Murphy，1992）、杨小凯和博兰（Yang & Borland，1991）、杨小凯和史鹤凌（Yang & Shi，1992）、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 Ng，1995）等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用超边际分析（基于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和其他非古典规划的方法）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杨小凯，1998、2003）。

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总框架下，杨格（Young，1928）在其论文中主要论述了迂回（或间接）生产方法的增加、产业间分工与企业分化，批评把报酬递增主要归结于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而忽视迂回经济和市场规模。在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纵向一体化与分化（Stigler，1951）、中间产品与技术进步（Ethier，1982；Judd，1985；Romer，1990）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杨格这里。然而，杨格的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早有深入阐述，从思想源流来看可以继续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而使理论的侧重点偏向了不同的方向（侯风云，2005）。

理论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既有从分工起源、本质、类型、功能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的，也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理论与斯密、李嘉图、涂尔干等进行比较研究的，还有从思想来源、发展脉络、逻辑进程、核心思想、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上开展系统性研究的（王磊，2016）。在经济理论界，孟捷（2004）基于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之间的区别，而且指出，两类分工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的，是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产生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协调两类分工的关系、从而达成某种秩序上所起的作用。侯风云（2005）认为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中关于企业的起源、分工和纵向一体化理论与马克思分工理论分析方法有共同之处，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分工类型划分及分析，对于理解现代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乔榛（2005）进一步提出应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为分析范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逻辑和企业理论等。孙广振（2015）认为，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与手工制造业劳动分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研究，只有到了马克思的手中才达到了其顶峰。这些研究挖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类分工”上的重要贡献，但都没有触及“斯密-杨格定理”。谢富胜和李安（2009）是少数用马克思分工理论批判“斯密-杨格定理”的研究，认为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共同发展的。只有从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之间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动态变迁入手，才能科学地解释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出了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这一研究为本文指明了方向。

本文认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最完整地表述“斯密-杨格定理”的内容，阐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及其持续运行条件的思想。这一思想适应于自原始共同体之间开始接触交换以来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适应于自原始共同体解体以来的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斯密-杨格定理”的命名，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工与市场思想上的贡献，尽管一些学者对纠正这种局面做出了努力，但还需要进一步追溯思想渊源、梳理发展脉络、解析理论结构，从思想史和理论结构上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工与市场思想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为此，有如下问题需要探讨：（1）《共产党宣言》中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思想的形成，《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两类分工”相互促进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2）马克思为何在提出“社会分工”或“社会内部的分工”、“工厂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分工”等概念的时候，还要在更为一般意义上提出“第一类分工”和“第二类分工”的概念？（3）“第二类分工”能否与“工厂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分工”直接等同？“两类分工”相互促进是否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开始的？（4）如果把“第二类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厂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分工”直接等同的话，由于马克思说“第二类分工”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就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但并不仅限于此），这似乎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使命不相吻合，这个矛盾如何协调？（5）根据马克思关于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的界定，如何进一步解析分工的内在结构，从而更好地阐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机制。

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根据《共产党宣言》提炼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思想；第三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进行思想溯源；第四部分阐述“两类分工”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第五部分节基于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解析分工的内在结构，阐述以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最后是结论与意义。

二、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

在《共产党宣言》这篇光辉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历史发展过程，阐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以及这一发展机制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

**（一）经济发展机制：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相互促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这样的阐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3]](#footnote-3)以至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footnote-4)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从行会分工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大工业分工，从“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到“工业范围的扩大”的演进，市场扩展是重要的拉动力，即市场扩展促进了分工发展。二是通过工业革命及其机器大工业的分工发展，不仅增加了产业门类，并且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也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扩展了市场范围、建立了世界市场。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真正的大市场。正如他们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footnote-5)“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footnote-6)也就是说，分工发展又促进了市场扩展。由此可见，“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马克思还指出，斯密在分工上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强调分工的意义”，[[7]](#footnote-7)但“关于分工，亚当·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8]](#footnote-8)并且，是色诺芬最早提出“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规模”，[[9]](#footnote-9)“实现分工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的扩大”。[[10]](#footnote-10)而杨格到1928年才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与市场关系的相关论述比斯密的更全面，比杨格的更久远。

（二）**机制持续运行条件：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

与斯密、杨格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这一发展机制，还揭示了这一发展机制持续运行的条件，即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是决定这一发展机制能否持续循环累积下去的制度条件。如果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社会矛盾与对立（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等）就会累积起来，这一发展机制将不断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1]](#footnote-11)所以，“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12]](#footnote-12)

综上所述，从思想史的发展贡献来看，我们认为把“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命名为“斯密-杨格定理”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贡献。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阐述了类似的思想：（1）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存在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2）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保证这一发展机制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可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适合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13]](#footnote-13)。

三、分工与市场关系思想溯源：《共产党宣言》前的理论准备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14]](#footnote-14)所以，分工是打开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扇“方便之门”。《共产党宣言》包含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前期进行世界观、方法论、现实及历史考察与科学理论准备的必然结果。他们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可概括为：（1）从1841年马克思完成其博士论文开始，历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神圣家族》（1844年），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确立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2）1845至1847年，根据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从分工方面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从抽象转化为具体，这是《共产党宣言》前最为重要的理论准备；（3）至1848年发布《共产党宣言》，阐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及其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这里，我们将重点回溯《共产党宣言》前理论准备所呈现出的分工与市场关系思想。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与市场思想**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重要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系统批判，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趋势进行考察分析中，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中，回答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怎样形成的问题，这与分工发展紧密相连。

**1.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形成的前提。**当人还没有把自己与动物界区分开来的时候，谈不上社会关系的形成。“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首先要把人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footnote-15)也就是说，人把自己与动物界甚至整个自然界区别开来，是从人自己能够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这也是社会关系的开始。

**2.生产力与分工发展决定并促进社会关系（包括社会结构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分工发展水平决定一个民族内部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程度、交往关系及内部结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6]](#footnote-16)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7]](#footnote-17)

分工促进所有制形式及其上层建筑的发展，而所有制形式又决定分工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分析了与生产力及分工发展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即分工促进所有制形式及其上层建筑的发展。一方面，“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18]](#footnote-18)另一方面，分工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由所有制形式决定。“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关系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19]](#footnote-19)在此基础上，“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0]](#footnote-20)不仅如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1]](#footnote-21)总之，“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2]](#footnote-22)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的有力批判！

**3、分工导致生产力、社会结构和意识之间的矛盾。**首先，“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3]](#footnote-23)从分工发展的源头开始，“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4]](#footnote-24)

其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随着分工发展而产生。“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5]](#footnote-25)

最后，自发分工产生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发展终将要改变异己的状态。“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6]](#footnote-26)。因为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是专业化的，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於于其中。“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7]](#footnote-27)但这种“异己状态”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私有制的消灭”而被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28]](#footnote-28)

**4、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演化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从行会分工演化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分工作了这样的阐述。（1）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随着城市的出现，在对立与竞争中形成了行会这种全国性的封建组织。在中世纪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在行会内部，各劳工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工都必须熟悉掌握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29]](#footnote-29)从这里可以看到，没有社会交往和需求的扩大，分工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

（2）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以及城市间的分工发展。商人的跨地域流动，使不同地区可能建立贸易联系，这取决于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随着商人所促成的更大地区范围的通商，在生产和商业之间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

（3）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除此之外，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还受到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的制约。“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的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30]](#footnote-30)织布不需要很高技艺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于是封建行会制度受到冲击，工场手工业逐步发展，而“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31]](#footnote-31)

（4）世界市场催生了大工业，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在各国工场手工业的竞争过程中，“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居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32]](#footnote-32)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33]](#footnote-33)国内自由竞争和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大工业发展进程，消灭了工场手工业。

（5）随着分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断变革，最终消灭了自发的、异己的劳动分工。关于私有制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存在。”[[34]](#footnote-34)因此，私有制的产生与分工紧密相关。随着生产条件与劳动者分裂程度的不断加剧，产生了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劳动成为一种屈从行为，而不是自主活动。在劳动组织关系上，从行会分工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大工业分工，封建宗法关系为以金钱为纽带的雇佣关系所替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工场手工业制度又成为大工业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成为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容的程度，“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35]](#footnote-35)

至此可以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基本逻辑：城乡分工产生了行会制度下的手工业；商业与生产分工产生了商人阶级，商人阶级起到扩大市场范围的作用，促进城市间手工业的分工发展；城市间分工，产生工场手工业；各民族交往扩大、人口增长与集中，繁荣了工场手工业；世界市场、国内自由竞争与科技发展催生了大工业，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显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彰显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同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是在人类的分工与交往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孕育了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了社会矛盾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相互促进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既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剖人类社会发展获得的重要发现，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哲学的贫困》的分工与市场思想**

到1847年，马克思完成了《哲学的贫困》，其在理论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延续、拓展与升华，继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中剖析人类社会关系的本源与发展，拓展对经济问题（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分工、竞争与垄断、土地所有权与地租等）的认识，阐明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孕育的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抗性和阶级的对抗性，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力量。《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36]](#footnote-36)“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37]](#footnote-37)

《哲学的贫困》是《共产党宣言》最为重要的又一理论准备。关于分工，其提出了一些重要论述。（1）分工形式不断发展，分工的不同形式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绝大部分组织形式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或者说，没有分工，几乎就没有社会组织。（2）“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之间的权力消长关系。马克思把分工划分为“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两类，其中，“社会内部的分工”是分工通过市场交换在独立主体之间（如公社间）展开，通行自由竞争规则。“工场内部的分工”是分工在同一个主体内部展开。“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38]](#footnote-38)尽管“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都受“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的规制，但马克思已经开始区分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之间在通行规则上的差别，他指出：“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39]](#footnote-39)科斯（Coase，1937）关于企业与市场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在马克思这里。（3）再次精炼论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40]](#footnote-40)“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41]](#footnote-41)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来，“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42]](#footnote-42)这说明了市场扩展促进分工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发展，而机器大工业的分工发展促进世界市场的发展。（4）创新与分工相互促进。一方面科技创新促进分工发展，“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43]](#footnote-43)另一方面分工也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44]](#footnote-44)

综上所述，《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分工与市场关系思想，不是偶然的产物，是在前期确立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结合现实与历史，剖析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进程，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结果。这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科学论证。

四、“两类分工”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

1850年后，马克思重新进行经济研究工作，从经济学手稿（1857-1858、1861-186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到《资本论》，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艰难的科学研究，阐述了“两类分工”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

**（一）“两类分工”的含义**

从《哲学的贫困》使用“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45]](#footnote-45)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使用“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厂内部的分工”[[46]](#footnote-46)，再到《经济学手稿（1861-1863）》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第一类分工与第二类分工[[47]](#footnote-47)，反映的是第二类分工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与特殊性。对于不同时代，第二类分工有与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反映不同生产关系的不同名称。现在用的企业内分工，曾经叫工厂内分工、作坊内分工、家庭内分工、公社内分工、共同体内分工等，可以泛指一切不以市场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它服从家长的、或所有者的、或统治者的、或计划者的“权威”，通行的规制是计划调节机制。例如，马克思在分析印度公社时指出，公社尽管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它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48]](#footnote-48)例如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等。马克思指出，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49]](#footnote-49)在这里，马克思把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有印加国都看作是共同体的不同形式。马克思又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50]](#footnote-50)那么，在印度公社的社会分工中，通行的规则肯定不是市场调节，而是受制于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等规制的非市场调节，或计划调节，因此属于“第二类分工”。作为家长制家庭的内部分工具有类似属性，自然也属于“第二类分工”。马克思指出，“与后一种意义上的分工（即“第二类分工”——引者注）相应的是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51]](#footnote-51)但并没有说“第二类分工”就只是工场手工业分工。因此，不能把“第二类分工”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企业内部分工”或“工厂内部的分工”。我们把第二类分工统称为团队化分工组织。工场内分工、企业内分工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来的团队化分工组织，服从所有者的权威。它们“发生在一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当作特殊的、独立的商品进入市场或进入流通之前的生产中”，[[52]](#footnote-52)“各种特殊劳动在资本指挥下通过直接的、不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协作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53]](#footnote-53)生产者“表现为不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商品，即一般商品，其中每一个人不是代表一种特殊劳动，而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动中的个别操作，而整个商品的所有者即生产者，作为资本家与他们——不独立的工人——相对立”。[[54]](#footnote-54)

第一类分工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分工……第一类分工的表现是：每一种商品是其他商品的代表，因此，每一个商品所有者或生产者在另一个人面前都代表一个特殊的劳动部门，而这些特殊的劳动部门的总体即它们作为社会劳动整体的存在要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或进一步说要以商品流通为媒介，而这种商品流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包括货币流通在内……在第一类分工中，生产者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和特殊劳动部门的代表互相对立”。[[55]](#footnote-55)两类分工的根本差别在于通行规则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56]](#footnote-56)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代表第一类分工的社会分工，实际上是市场分工。我们把第一类分工称为市场化分工组织。现在通常所讲的企业分化、企业间分工、业务外包等，都属于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组织，通行的规制是市场调节机制。

根据马克思使用社会分工或“社会内部的分工”一词的不同语境，社会分工有时是从使用价值角度来看的，是“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57]](#footnote-57)马克思又说：“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58]](#footnote-58)从这两处引用来看，所讲的“社会分工”和“整个社会内的分工”是讲同一个对象，因为都包含“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含义，是各种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但是，“那种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成整个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对这种生产的各个代表发生作用的社会内部的分工”[[59]](#footnote-59)肯定不是各种经济形态所共有的，如印度公社就没有商品，但有社会分工。这里的“社会内部的分工”是市场化分工，与社会分工又不能划等号。社会分工既有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也有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马克思还指出：“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与后一种意义上的分工相应的是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60]](#footnote-60)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似乎所指也不同，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是第二类分工中的一种，作为同一个工厂内部的分工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但却是“社会分工”，即“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在这里也不能划等号。所以，为了避免概念混淆，在本文后面，社会分工仅指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划分为不同劳动部门的情况，即“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对于社会分工如何组织协调，则存在两种基本组织方式，一种是市场化分工组织，即第一类分工，通行竞争的权威，即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来协调；另一种是团队化分工组织，即第二类分工，通行处于支配或协调地位之主体的权威，即计划调节机制。这正是马克思批评斯密没有看到的“两类分工”的差别。

1. **“两类分工”相互促进**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静态上论述市场化分工组织与团队化分工组织之间在权力上的此消彼长关系。但马克思并不是“替代论”者，因为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动态上论述了“两类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核心是这“两类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尽管殖民及战争也会影响市场扩展与分工发展。

从分工起源来看，当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人类互通有无的倾向时，马克思对此予以了批判与纠正。斯密为了说明分工就假定有了交换，而为了要有东西可交换又假定存在“有无”之别，假定有了分工。对此，马克思指出：“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起初是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这种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本身的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公社所拥有的生产的自然因素为基础。）当然，产品发展成为商品，商品交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交换和分工互相发生影响。”[[61]](#footnote-61)自然分工中氏族内分工、家庭内分工和公社内分工都属于第二类分工，而氏族之间和公社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换，形成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交换和分工互相发生影响”实际上也就是“两类分工”之间的相互影响。

对于商品社会，马克思又进一步认为，在“两类分工”中，第一类分工是第二类分工的出发点和基础，并且，“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第一类分工就不会有第二类分工，尽管第二类分工在产品还没有被当作商品来生产，还不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情况下也能发生”。[[62]](#footnote-62)也就是说，只有为市场而生产，第二类分工（如作坊内分工、工场手工业分工、企业内分工）才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否则，这些团队化分工组织就难以生存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美洲的发现、市场的扩大（也就是市场分工发展，从一国内扩展到多国间，形成世界市场）是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63]](#footnote-63)而第二类分工又必然会发生反作用，扩大第一类分工。首先，第二类分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缩短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而就为一个新的社会劳动部门腾出了劳动”，[[64]](#footnote-64)从而促进新产业的发展，创造产业间社会分工与市场分工的物质条件。其次，第二类分工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划分为若干部分，“结果是同一个使用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现在可以被当作彼此互相独立的不同商品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同一个使用价值的不同种类，过去属于同一个生产领域，现在由于个别生产领域的分解而属于不同的生产领域”。[[65]](#footnote-65)这样，第二类分工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市场化分工的发展。这一点对于信息时代仍然适用，集成模块化就是促进信息产品生产过程分解，进而促进信息产业间分工与企业分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张其仔](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6%E4%D7%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2008）。

马克思认为“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如果说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因为它在现有工厂的基础上把各种操作进一步作了分解，让一定数量的工人从属于这些细分的操作，那么，反过来说，由于这些‘诗人的分散的肢体’事先就已作为这么多互相无关的商品，从而作为这么多互不依赖的商品所有者的产品而独立并存着，分工又是互不依赖的商品所有者在一个机构中的联合。这是亚当·斯密完全没有看到的一个方面。”[[66]](#footnote-66)“那种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成整个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对这种生产的各个代表发生作用的社会内部的分工，会同那种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完全消灭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资本指挥下的一个社会机构的部件的工厂内部的分工，并行不悖地一起向前发展。”[[67]](#footnote-67)“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同工厂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分工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分工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的，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产生。”[[68]](#footnote-68)也就是说，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具体表现为团队化分工组织与市场化分工组织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原始社会是一个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尽管原始公社内部分工是自然分工，但不能把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对立起来，自然分工是就分工形成的客观依据与自然条件而言，由于“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69]](#footnote-69)因此，原始公社内部分工也是社会分工）；当原始部落开始接触交换时，市场化分工得到发展，同时扩大了社会范围进而也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原始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化分工发展瓦解了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而私有制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逐步发展；现代社会形成了既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也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市场化分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形成以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整个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第二类分工组织出发，经过两类分工组织的高度发展与相互促进，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第二类分工组织，在那里，消灭了商品，消灭了自发的、异己的劳动分工。如果说还存在劳动分工，也是自觉的、自主的、自由的劳动分工，通行计划调节，是劳动分工充分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两类分工”相互促进从原始共同体之间相互接触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才有的。

**（三）“两类分工”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经常被用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问题的重视，以及分工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的命题：“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70]](#footnote-70)对于这一命题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某一方面”究竟指哪一方面？二是为什么是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组织，而不是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组织？理论界至今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1.“某一方面”是指生产关系方面**

马克思说：“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只把它当作资本的特殊的生产力来考察。”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而马克思在这里又只把第二类分工当作生产力来考察，“但是”这一转折词就表明暂时撇开生产力的对应面即生产关系方面。如果把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意思就是：尽管这里只把第二类分工当作资本的特殊的生产力来考察，但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它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这样的逻辑推理符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所以，根据前后文我们认为，“某一方面”指的是与生产力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即生产关系。

**2.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组织更能反映不同时代生产关系的本质**

从历史发展来看，第二类分工，如公社内分工、家庭内分工等团队化分工组织要早于市场化分工组织。市场化分工是从两个相反的起点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71]](#footnote-71)“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起初是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72]](#footnote-72)另一个是公社内人口增加（特别是氏族间征服），导致公社规模扩大，“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73]](#footnote-73)并且公社之间的交换成为瓦解公社本身的主要推动力。“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74]](#footnote-74)市场化分工得到了发展！

如前所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是在人类分工与交往的实践中形成的，从两类分工的发展历史来看，分工与交往首先是从第二类分工开始的，而不是从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开始的。作为研究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把以市场为媒介的第一类分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那么，必将导致曾经的一段历史（自然分工）被排除在理论研究之外，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将出现严重脱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导致今后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也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

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分工是多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这说明正是第二类分工从公社内分工、家庭内分工、作坊内分工到工场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发展更能反映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革，更能反映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特殊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正是通过解剖第二类分工中工场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

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组织更能反映不同时代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正是第二类分工而不是第一类分工，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75]](#footnote-75)，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限定于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商品生产与交换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形态，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已成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76]](#footnote-76)，那么，用“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这一“笼统”的命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五、基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经济发展机制

既然“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那么，理论的表征何在？一种是基于起点范畴的演绎逻辑：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起点范畴，而商品以分工为前提，先有分工范畴，才有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无疑是对的。我们认为，一个范畴要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范畴，或者成为理论的底层逻辑要素，最好能够从中演绎出该学科所回答的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基本问题。从分工范畴出发，是可以演化出经济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的，但这必须以马克思对分工范畴的科学界定为基础。马克思说：“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77]](#footnote-77)正因为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就不能把它只看作是生产力的范畴，或只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范畴，或只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秦庆武，1983），而应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总体形态”。我们在这里提出基于总体范畴的系统结构来讨论“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目的在于揭示分工的内在结构与机理，进一步阐明基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经济发展机制。

**（一）内在构成：分工作为“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分工作为“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的内在构成，具体表现为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

1.专业多样化。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二因素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时指出：“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78]](#footnote-78)正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具体性与特殊性形成不同的劳动方式，“表现为社会劳动的总体或整体分成各种劳动方式，表现为各种特殊劳动方式的整体”[[79]](#footnote-79)，进而创造了使用价值的多样性。这种劳动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种多样上，这些使用价值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同样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80]](#footnote-80)。也就是说，从社会整体或宏观整体来看，劳动分工表现为产品与劳动方式的多样性，即专业多样化。这代表了经济学中社会范围内生产什么的选择问题。

2.劳动专业化。马克思说：“以较为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交换价值，按照交换本身的发展程度，要求不是由一个人（社会）去完成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他的劳动时间花费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而是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81]](#footnote-81)这就是劳动专业化（或专门化），代表了经济学中微观层面（如个人、家庭与企业）生产什么的选择问题。同时，劳动专业化也反映了劳动组织方式，也是怎样生产的问题。另外，对于工场内或企业内分工，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82]](#footnote-82)，是“以协作为前提或者只是协作的一种特殊形式。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厂等等也是这样”[[83]](#footnote-83)。因此，对于微观主体内的分工来说，劳动专业化的另一面是劳动协作化，它们不是两件不同的事物，而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工场内或企业内分工是劳动专业化与劳动协作化的统一。自工场手工业以来，劳动专门化与劳动协作化在微观主体内的分工中是统一和同一的。[[84]](#footnote-84)专业多样化与劳动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基本方面，缺一不可。只有劳动专业化，如每个人都只生产粮食，则没有分工；只有专业多样化，每个人都生产自己需要的各种产品，同样也没有分工。

3.生产迂回化。所谓迂回生产，是指借助生产工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来生产最终产品，以提高最终产品生产力的生产方法。迂回生产代表怎样生产的问题，也是分工的重要构成部分。一方面，迂回生产可以直接创造分工。对此，马克思说：“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85]](#footnote-85)另一方面，从市场化分工的必要条件来看，即使上述专业多样化与劳动专业化存在，也不一定有市场化分工。交换最初只是剩余物品的交换，有了剩余物品，才可能交换，才会有市场化分工。而剩余物品是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从最初交换剩余产品到为市场而生产，都是建立在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基础上的，而迂回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产生剩余物品的重要途径。马克思说：“不言而喻，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86]](#footnote-86)而且，“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87]](#footnote-87)，“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88]](#footnote-88)。没有迂回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就不会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化分工。

4.经济组织化。随着分工中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的发展，势必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组织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分工的不同形式正是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89]](#footnote-89)以迂回生产为例，生产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能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并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推动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变革的最重要物质力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早就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0]](#footnote-90)因此，正如马克思说：“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91]](#footnote-91)

经济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协调分工从而使社会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是与封闭、孤立、缺乏联系的自然经济相对立，是对自然经济状态的否定与超越（向国成、韩绍凤，2007）。经济组织化又制约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专业多样化的发展，所有权、科层组织（包括企业、政府等）、市场、城市、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地租、保险、货币等都是组织化的内容、载体或工具。经济组织化既反映怎样生产，也体现为谁生产。

上述分工的四个方面，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专业多样化大致代表生产力方面，经济组织化则代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抽象原理就具体转化为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专业多样化与经济组织化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作为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相互促进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就转化为经济组织化适应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和生产迂回化的发展要求。至于更为具体的转化，则需要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例如，相对于把战俘从肉体上消灭而言，作为经济组织化具体形式的奴隶制[[92]](#footnote-92)则把战俘作为奴隶主的奴隶和财产保存下来，开展劳动的分工与结合，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肯定了奴隶制的这种历史进步性。又例如，对于现代社会，保险作为经济组织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协调分工的重要工具，没有保险就没有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杨小凯，2003）。

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专业多样化和经济组织化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综合表示出来。[[93]](#footnote-93)一个生产者的劳动专业化加上生产迂回化，可以生产出所选择的特定产品；无数这样的生产者组合，就会形成专业多样化的局面；不同生产者的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组合，决定怎样生产，而怎样生产又决定能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最后决定为谁生产。由此可见，从分工作为“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的内在构成（表现为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出发，可以演化出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四个基本问题，体现了总体范畴的系统结构性特征。[[94]](#footnote-94)因此，分工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

专业多样化

劳动专业化

经济组织化

生产迂回化

怎样生产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为谁生产

图1 分工与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

分工：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

**（二）内在机理：基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框架**

根据分工的内在结构，依据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内在逻辑，可以绘制经济发展机制基本分析框架（见图2）。它由分工发展、市场扩展及需求侧、生产力水平及供给侧、政府四大部分组成，其中，分工发展产生政府，形成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

需求侧体制政策 供给侧体制政策

交易秩序

体现并决定

促进

市场范围

（人口规模）

收入消费水平

收入消费结构

图2 基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框架

政府：正义秩序与体制政策

分配秩序

共同富裕程度

（需求侧）

分 工 发 展

劳动专业化

专业多样化

生产迂回化

经济组织化

决定

市 场 扩 展

经济总量、结构及质量

就业总量、结构及质量

全要素及劳动生产率

交易效率

生产力水平（供给侧）

产生

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95]](#footnote-95)正是在分工发展中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96]](#footnote-96)，于是就有了政府。政府是人类分工发展、经济组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作为现代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良好的交易秩序、分配秩序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其他体制政策来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扩展及需求侧由市场范围、人口规模、收入消费水平与结构等构成，反映一定市场范围内的共同富裕程度，决定市场规模；市场扩展促进分工发展，分工发展既体现生产力水平，又进一步决定生产力水平，形成生产力水平及供给侧，如经济总量结构及质量、就业总量结构及质量、全要素和劳动生产率、交易效率等；生产力水平又决定市场范围、收入消费水平和结构等，亦即共同富裕程度。共同富裕程度决定市场规模及扩展程度，市场规模及扩展程度又促进分工发展。这样，就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循环累积的因果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和方面的改善都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尽管分工发展不充分会产生贫富差距，而要最终消除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恰恰需要更加充分的劳动分工发展。这一链条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现代经济问题基本可以纳入这一体系开展研究（向国成等，2017）。在此仅举四例：

**1.基于马克思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的发展新优势问题**

“发展新优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就指出：“不能总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2020年7月25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2020年8月30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思想已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特别注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展新优势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自李嘉图（1817）以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或者说比较优势决定分工格局，深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决策与实践。按照“比较优势决定分工格局”，就应该放弃哪怕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要发展，也应该等比较优势条件成熟再发展。发展新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要超越已有的比较优势，显然不是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所支持的。但是，根据向国成和刘晶晶（2020）对马克思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的研究，尽管自然禀赋在人类社会的较长历史时期中都对分工格局起着主导作用，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认识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为一国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提供了可以超越现有要素禀赋结构的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比较优势制约分工格局，但劳动分工也可以培育内生优势，改变比较优势格局，这是马克思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

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机制中，贯彻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培育和发展内生优势，就可以成为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理论支撑。

**2.基于“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与结合”的新发展格局问题**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97]](#footnote-97)由此提出了“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思想。这对于认识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分工格局与经济循环的有机统一，需要以一定的分工格局为载体（刘元春，2020；黄群慧，2021；任保平，2021）。首先，它包含了国家内与国家间两个层面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其次，突出国家内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是立足之本，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再次，统筹兼顾这两个层面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使之相互促进。因此，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向国成、刘晶晶，2020）。

立足国内为主实现“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包括：（1）不仅体现在同一产品及其组成部件的分工与结合上（即产品内分工与结合），也体现在不同产品产业的分工与结合上（即产业内与产业间分工与结合）；（2）不仅体现在个体力量所能达到的分工与结合上，也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达到个体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分工与结合上；（3）不仅体现在同一时期产品产业生产的分工与结合上，也体现在跨期新产品产业创新的分工与结合上；（4）不仅体现在一个地区内产品产业的分工与结合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产品产业的分工与结合上。

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将有力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其基本机制是：“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促进市场扩展，市场扩展又促进“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即“‘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市场扩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循环累进的发展机制。这是对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机制的进一步具体化。

**3.使用价值与价值对立运动和制度政策偏向相结合的经济危机问题**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至今，经济危机理论林立，但并没有形成对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都能进行合理解释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向国成和曾祥炎（2013）主张“回到马克思”，在其建立的“分工与所有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逻辑链条上，结合财产权、财政权、货币权的偏向性宏观影响，对各种经济危机给出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诠释。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社会，分工与私有制产生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使生产与消费在时间、空间、主体上的脱节与失衡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有制与财产权）产生对抗性分配关系，导致社会化大生产（即分工发展问题）与市场相对缩小（即市场扩展问题）的矛盾日益尖锐，进而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运动演化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的经济形态，甚至实体经济国（生产国）与虚拟经济国（消费国）并存，财产权、财政权、货币权，甚至军事权等制度政策以及它们的组合，会极大增强生产与消费失衡，并演绎出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如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等。

回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发展机制上来，就能够对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提供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

**4.基于投资分工潜力的经济周期问题**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相互促进的发展链条中，消费发挥基础性作用，投资发挥关键性作用。投资既是现在的需求，又是未来的供给，决定未来的生产力水平，进而决定未来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社会总生产转换曲线是唯一的，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代表潜在生产力。在没有达到潜在生产力前，储蓄转化为投资将会带来经济增长。然而，潜在生产力主要与生产要素数量相关，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投资规模，并且是立足于现在的总需求，而不是未来的生产力。问题在于即使生产要素数量相同，由于分工水平与模式不同，社会总生产转换曲线会有很多条，呈现高低不同的局面，社会总生产转换曲线从低生产力水平向高生产力水平演进，这就是发展问题（杨小凯，2003）。这不仅仅是投资规模问题，还有投资什么、在哪里投资、谁来投资等问题，这关系到能否形成更多新产品、新产业、新产业链与新产业集群，能否提高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能否把更多的经济主体卷入市场分工体系。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与资本理论思想，投资与资本是种社会关系，是种扩大再生产与发展分工的工具，有了分工创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储蓄和投资才可能改进生产率。我们把这些思想概括为投资分工发展潜力理论。

“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关键就在于投资的分工发展潜力有多大，包括产品产业横向拓展潜力、产品产业纵向拓展潜力、效率提升拓展潜力和市场规模拓展潜力。如果投资能够形成更多新产品、新产业、新产业链与新产业集群，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能够把更多的人口卷入市场分工体系，众多人口就可以被利用来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通过扩大市场供给和需求总规模，增加产品产业多样性，获得多样化经济；提高专业化程度，获得规模、学习与创新性经济；通过迂回生产，获得更高生产效率；超大规模人口就可以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又为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投资的分工发展潜力越大，乘数效应越大，就业容量就越大，就越值得投资。例如，高铁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带动了与高铁相关的新产品、新产业、新产业链与新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在扩展市场规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把更多的经济主体卷入了市场体系。

经济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投资分工发展潜力。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大致经历了两个20-30年（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的经济周期。如何来解释这种周期性？与之接近的是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1930）。由于库兹涅茨周期是以[建筑业](http://baike.so.com/doc/2598831-2744167.html)的兴旺和衰落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而在我们看来，它是一定市场范围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周期，因为建筑业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衰退象征着一定市场范围内工业化城市化投资的分工潜力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战后重建，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范围内，重工业、轻工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已经成熟，这一轮工业化大规模投资的分工潜力基本挖掘殆尽，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滞胀”。这时，如果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市场扩展，使上一轮投资形成的生产力继续发挥作用；二是发展新技术及其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切合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扩展的需要，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开始兴起促进新的分工发展，这两个基本面使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80年代逐步走出“滞涨”状态。2008年之后，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后半场”，上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投资的分工发展潜力在本国市场范围内已显露衰减迹象，这正是2010年以来我国需求刺激政策效应递减的根源所在。要使中国经济今后继续保持有一定速度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向工业化城市化尚不成熟的地区和国家扩展市场范围，如国内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挖掘上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投资的分工发展潜力，这是投资分工发展潜力的“形成-衰退-再扩展”（对应的是扩展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对于分工潜力大的领域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拓展未来发展空间，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是投资分工发展潜力的“形成-衰退-新发展”（对应的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产业集群的分工发展）。这是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发展机制下，基于投资分工潜力对经济周期给出的一种解释。

六、结论与意义

从思想史的贡献来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最完整地阐述了“斯密-杨格定理”所包含的内容，揭示了：（1）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这一重要的经济发展机制；（2）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保证这一发展机制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这一发展机制适应于自原始共同体之间开始接触交换以来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从科学理论体系来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再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1861-1863）和《资本论》，贯穿了以下逻辑一致的基本内容：（1）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分工放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分工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从抽象转化为具体的重要范畴；（2）分工作为“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其内在结构是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由此演化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分工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3）在组织方式上，“两类分工”的划分及其相互促进关系，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超越“斯密定理”关于市场范围的外生决定论，而揭示了市场规模内生的基本机理；（4）第二类分工从公社内分工、家庭内分工、作坊内分工到工场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发展更能反映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革，更能反映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特殊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正是通过解剖第二类分工中工场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进而揭示了上述经济发展机制不断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打断的内在必然性。

把分工的内在结构融入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累积循环的相互促进关系中，可以形成经济发展机制基本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有利于把现实经济问题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体系之中，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 恩格斯，1932：《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译本。

马克思 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译本。

恩格斯，1880：《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译本。

黄群慧，2021：《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第5期。

侯风云，2005：《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李嘉图，1962：《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刘元春，2020：《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理论导报》第10期。

孟捷，2004：《产品创新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当代经济研究》第9期。

乔榛，2005：《马克思分工理论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范式》，《经济学家》第3期。

秦庆武，1983：《论分工的本质——兼与董田春同志商榷》，《求是学刊》第6期。

任保平，2021：《“十四五”时期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孙广振，2015：《劳动分工经济学说史》，李进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磊，2016：《马克思分工理论研究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期。

谢富胜，2009：《[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5&CurRec=4&recid=&FileName=STUD200909008&DbName=CJFD2009&DbCode=CJFQ&yx=&pr=&URLID=&bsm=QS0101;QS0401;X01;)》，《[马克思主义研究](https://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STUD&UnitCode=&NaviLink=%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e7%a0%94%e7%a9%b6)》第9期。

向国成 韩绍凤，2007年：《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

向国成 曾祥炎，2013年：《从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到欧债危机：一致性的理论诠释》，《经济学家》第2期。

向国成 等，2017：《分工、均势经济与共同富裕》，《[世界经济文汇](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ZWH)》第5期。

向国成、刘晶晶，2020：《论劳动分工改变比较优势格局及政府作用》，《社会科学》第11期。

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译本。

杨小凯，1998：《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小凯，2003：《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其仔](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6%E4%D7%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2008：《模块化、产业内分工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9%E7%BB%E1%BF%C6%D1%A7%CE%C4%CF%D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Becker, G. and K. Murphy (1992),“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1137-1160.

Coase, R.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4: 386-405.

Ethier, W. (1982),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389-405.

Judd, K. (1985),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tents”, *Econometrica*, 53: 579~585.

Kuznets, S. S.(1930)，*Secular-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7.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S71~S102.

Rosen，S. (1983), “Speci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 43~49.

Stigler, G. J. (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3): 185~193.

Stigler, G.J. (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199-1213.

Yang, X. and J. Borland (1991),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60~482.

Yang, X. and H. Shi (1992), “Specializ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392~398.

Yang, X. and Ng，Y-K (1995),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th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6: 107~128.

Young, A. A.(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38(152):527-542.

**Marx and Engels'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Though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Xiang Guocheng1、2 Liu jingjing2 Luo manyi2**

（1.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Common Wealth ,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 Changsha；2.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Abstract:** After combing through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We found that they had already elaborated the cyclically accumu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is is called the "Smith-Younger theorem" by theo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naming completely ignores the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of Marx and Engels.Faithful to the classic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his article mainly to carry out the following work: (1)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ought,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from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t is stated that Marx and Engels's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e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2) Clarify the status of the "two types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expansion, and propos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category of all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3)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overall form of social labo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division of Labor is analyzed, It propose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cyclically accumulate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and explains the real economic problems on this basis, and illustrat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 and Engels’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thought.

**Keywords:**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Expansion of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1. \*向国成，湖南工商大学中国共同富裕研究中心、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410205，电子邮箱：466125939@qq.com；刘晶晶、罗曼怡，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11201，电子邮箱：[674277196@qq.com，690552045@qq.com](mailto:674277196@qq.com，690552045@qq.com)。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测度研究”（20BTJ011）。感谢审稿人意见，文责自负。 [↑](#footnote-ref-1)
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页。 [↑](#footnote-ref-2)
3.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29页。 [↑](#footnote-ref-3)
4.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footnote-ref-4)
5.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32页。 [↑](#footnote-ref-5)
6.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footnote-ref-6)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footnote-ref-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footnote-ref-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footnote-ref-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footnote-ref-10)
11.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footnote-ref-11)
12.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恩格斯后来指出：“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footnote-ref-1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footnote-ref-13)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9页。 [↑](#footnote-ref-14)
15.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footnote-ref-15)
16.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footnote-ref-16)
17.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footnote-ref-17)
18.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 [↑](#footnote-ref-18)
19.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footnote-ref-19)
20.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footnote-ref-20)
21.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footnote-ref-21)
22.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footnote-ref-22)
23.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8页。 [↑](#footnote-ref-23)
24.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footnote-ref-24)
25.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9页。 [↑](#footnote-ref-25)
26.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footnote-ref-26)
27.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footnote-ref-27)
28.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footnote-ref-28)
29.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footnote-ref-29)
30.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 [↑](#footnote-ref-30)
31.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footnote-ref-31)
32.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 [↑](#footnote-ref-32)
33.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footnote-ref-33)
34.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footnote-ref-34)
35.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77页。 [↑](#footnote-ref-35)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footnote-ref-36)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footnote-ref-37)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footnote-ref-38)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footnote-ref-39)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footnote-ref-40)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footnote-ref-41)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footnote-ref-42)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247页。 [↑](#footnote-ref-43)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footnote-ref-44)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footnote-ref-45)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footnote-ref-46)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footnote-ref-47)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页。 [↑](#footnote-ref-48)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 [↑](#footnote-ref-49)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50)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footnote-ref-51)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footnote-ref-52)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footnote-ref-53)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04页。 [↑](#footnote-ref-54)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footnote-ref-55)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5页。 [↑](#footnote-ref-56)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57)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9页。 [↑](#footnote-ref-58)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footnote-ref-59)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footnote-ref-60)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footnote-ref-61)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footnote-ref-62)
63. 马克思说：“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footnote-ref-63)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footnote-ref-64)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footnote-ref-65)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footnote-ref-66)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footnote-ref-67)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footnote-ref-68)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footnote-ref-69)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footnote-ref-70)
71.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footnote-ref-71)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footnote-ref-72)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页。 [↑](#footnote-ref-73)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页。 [↑](#footnote-ref-74)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5页。 [↑](#footnote-ref-75)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footnote-ref-76)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footnote-ref-77)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页。 [↑](#footnote-ref-78)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footnote-ref-79)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footnote-ref-80)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footnote-ref-81)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footnote-ref-82)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footnote-ref-83)
84. 即使是最原始、最简单、最抽象的协同劳动，也成为它更发展的、更具有专业划分的分工协作形式的特殊形式，而寓于其中。“在分工中也是许多人同时干同一种活。在自动工厂尤其是这样。“只不过，在分工中，协作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倍数比例原则上，［分工的］每一个特殊分支都必须按照［相同的］倍数使用［各种局部工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footnote-ref-84)
8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247页。 [↑](#footnote-ref-85)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footnote-ref-86)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435页。 [↑](#footnote-ref-87)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 [↑](#footnote-ref-88)
89. 马克思在分析各种不同制度下的分工时指出：“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footnote-ref-89)
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footnote-ref-90)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页。 [↑](#footnote-ref-91)
92. 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对奴隶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也是一种团队化分工组织。 [↑](#footnote-ref-92)
93. 在向国成等（2017）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 [↑](#footnote-ref-93)
94. 这里特别要说明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从因果关系来看，分工中的劳动专业化及其“干中学”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而技术进步说到底，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工具及中间产品等迂回生产发展带来的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新产品（包括品质改进）的专业多样化发展，这些本身是分工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从分工整体结构来看，技术进步又包含在分工之中。 [↑](#footnote-ref-94)
95.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footnote-ref-95)
96.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看到，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交换的剩余产品增加，促进分工发展，也促进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footnote-ref-96)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footnote-ref-97)